

热风学术

热风学术 | 第四辑

REFENGXUESHU

主编 王晓明 蔡翔
执行主编 雷启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热风学术

热风学术 | 第四辑

REFENGXUESHU

主编 王晓明 蔡翔
执行主编 雷启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风学术·第4辑/王小明,蔡翔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404-8

I. ①热… II. ①王… ②蔡… III. ①社会科学-文
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7829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

热风学术

第四辑

主 编 王小明 蔡 翔

执行主编 雷启立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25 插页 4 字数 433,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404-8/G·1375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阅读当下

借教育而行

陈清侨 许宝强

——论文化研究作为教学法与实用法的双重关键/5

信息化大学、专业知识的不平等分配及劳动的种族化/18

耐德·罗希特

“社会生活”的障眼法

罗小茗

——来自课程改革的思考/30

中学教育的自我主张

季 丰

——读《“社会生活”的障眼法》有感/50

重返现场

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与空间的再生产 罗 岗 李 芸

——“城市文本”与“媒介文本”的“互读”/57

再解读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社会学”/97

程光炜

“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成与建构/116

杨庆祥

贾平凹与 20 世纪 80 年代“寻根文学”/129

黄 平

这一个“福奎”

虞金星

——重读《最后一个渔佬儿》/144

文学内外

历史记忆的偿还与新历史主体的询唤/165

张慧瑜

家庭革命与伦理重建

冷 嘉

——对晚清思想的一种考察/182

热风·观察

西藏一年

林汉霏

——赴藏大学生志愿者的生活/201

如果有机会 我想再去西藏做一年志愿者/209

刘 丹

赴藏是改变我一生的决定/216

辛韞慧

“西部计划”志愿者收获了什么/219

高 翔

赴藏大学生志愿者五人谈/222

春春 等

热风·论坛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克服/231

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演变/231

Gilles Saint-Paul

修复金融责任/233

许成钢

“外在化”、风险和当前金融危机/236 Yann · Moulier-Boutang

当城市化遭遇全球化

陆 铭

——对于全球失衡的理解/238

中国金融专业知识的社会角色/242

Jakob Arnoldi

重庆模式的意义/244

崔之元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想象/247

全球性风险中的想象的共同体/247

Ulrich Beck

“九十年代”的终结/252

汪 晖

理论·翻译

为了围绕“现代”的对话之开端/261

坂井 洋史

日本文化的混杂性(节译)/268

加藤 周一

要是鲁迅还活着

荒 正人

——关于某种“负”面/273

关于微笑

佐藤 忠男

——拓植义春和他的作品/283

水平轴思想

冈本 惠德

——关于冲绳的“共同体意识”/290

穿透自我的思想

屋嘉比

——关于冈本惠德的《水平轴的思想》/328

编后记/332

阅读当下

这些年来,对学校教育的批评声越来越高。

其中一个很大的声音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太差了,教师水平差、还不认真、课程知识陈旧、学生毕业了没人要……不能说各级行政主管不着急,他们拟定了各种激励和管制措施,甚至硬性规定:凡教师填报的每一项学术出版成果,都必须附上原件,才能采信。但事情搞到这一步,要靠国内这一套行政机制来扭转局面,也就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了。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国际化”成了最后一条路。这其实是工业和经济领域实行了多年的办法,也正符合“不发达”国家上上下下的普遍心理,现在一搬进校园来,气势就极为汹涌。英文开始成为“高水平”的标志,上海某名校更明确规定:聘请来以英文授课的外国教授中,不得包括华裔!

在苏州城外,一大片簇新的高等教育区拔地而起,十余所校园中,除两所属于本地大学外,其余都挂着国内名校和境外大学的牌子:西安交大、北京人大、香港大学、利物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走在这些校园外的笔直的大道上,你真是仿佛置身某个硅谷式的工业园区,一家家跨国企业分踞道旁。如果将高等教育视为一个大市场,这些纷纷到异地开设分校,将弱小的本地大学挤到边上的大牌学校,跟那些跨国公司又有什么两样呢?最近十年,“Global University”逐渐成为全球竞争的一个新模式,越来越多的西方二三流、甚至四流大学,四处设立分店,“联合办学”。我在苏州城外看到的,不过是其中一例。

中国人想借“国际化”(更准确的说法是“西方化”)

来改善大学教育,西方大学则以“国际化”来染指中国的高教市场,如此局势,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前景又会如何?每一个明白高等教育对于中国之未来是如何重要的人,都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本期“阅读当下”栏的第一篇论文的作者,正是在宁波的某所 global university 中任教,他的切身感受和思考,当能对读者理解“全球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问题,提供特别的启发。

当然,中国学校教育的危机,并不只有上面这一种。最近十年来,公众愈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学校教育,非但没能有力地抗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日益失衡,反而助长了“赢家通吃”的倾斜趋势。如何扭转这一情形,已经成为校园内外有识之士注目和努力的焦点。就大学而言,种种努力之中,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名义展开的批判性教学,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一种。而在这一方面,香港岭南大学走在了前面,无论成败得失,都有诸多值得后行者借鉴的地方,本期“阅读当下”栏,特刊发香港“文化研究”教学的两位核心人物对他们与其同道多年努力的回顾和反思文章,所言中肯,值得慢读。

本栏还选刊了两篇对于中国大陆中等教育改革的分析文章。就对青年人身心的影响而言,中学阶段的6年,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因此,说得极端一点,如果中学教育搞不好,大学教育是好不了的。最近二十年来,中学教育的改革一轮又一轮,但其结果,似乎除了引发公众的一轮又一轮的失望,就不大有别的可说。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概括是过于片面了。今日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急需转变,还是社会

精神共识的急需构建,更都无法再容忍中等教育再长久地进退失据。因此,我特别请读者注意,本栏这两篇文章,在对中等教育现状的研判的大致接近之外,因其作者分站于中学校园内外的不同位置,对中学教育的未来可行之道,是有明确不同的理解的。越是情形复杂,思考就越需要有张力,仔细对读这两篇文章,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的。(王晓明)

借教育而行

——论文化研究作为教学法 与实用法的双重关键

陈清侨 许宝强*

虽然,近年来有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十分关注教育改革的情况,但例子不多。早在十多年前,Henry Giroux(1997:232)已有此观察;他指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研究致力于“把文化研究融入教育改革的话语里,更谈不上将其应用在大学及中学教育之中”。如今,亚洲地区内部均呈现多元变化,跃然有力的社会文化活力,有关的发展正是生机处处。而考虑到各地的本土环境独特,教育改革的议题更是众声喧哗,其在地因素复杂,社会处境也迥异。在这前提下,Giroux 此番批评就更显得铿锵有力,意义重大。事实说明,文化研究同侪间一般似乎更热衷于发表对流行文化、媒体、身份或酷儿理论或批评实践,少有如 Giroux 及其创刊的《教育、教学与文化研究》(*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1]般专心不二地致力于探索文化研究和教学、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Larry Grossberg 在一次接受 Handel Wright(2001:16)访问时,曾就这个学术现象上的落差失望地说:“文化研究的人,对学校、课程、教学目的、实践及准绳,以及相关政策的辩论等等战场,已经统统失去兴趣了”。当中原因,据 Giroux(1996)的分析,是教育家及文化研究学者

[1] 尽管如是,该期刊至今曾刊登两者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亦为数不多,值得注意的有如 Teasley 2004 及 Watkins 2000 等。

* 陈清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系主任,著作包括《盘点 HK 认真识识》(合著)、《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合著)等。许宝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告别犬儒》等。

〔2〕 所谓犬儒,在这里以 Žižek 之说为据,意即“他们明白,尽管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跟循一种虚幻,但他们仍然在这样做”。(Žižek 1989)

两方都不太愿意、也不太能够进行学术对话。他相信,文化研究以其所擅长的分析工具,可对各式文本的生产、接收及使用进行跨学科的微细研探,并藉此模式,积极拓展批判教学,打破文本阅读本身的局限,为检视我们的社会文化机制如何生产及传递知识这个深刻和关键的课题,提出新的理论架构及方法学上的论述。

我们一旦明确地把批判教学以至教育本身置于文化研究的核心实践领域来看,并肯定其必要性时,便可更具远见去洞察到文化研究对教育的意义和贡献,不必也不能限于单方面透过理论和方法论去补充批判教学所需的分析。于此,我们充分相信,文化研究应可更积极地去落实其初始以来奉社会变革为宗旨的批判性知识学术计划(project),渐次介入而成为教育的整体工作及过程中具实效的关键环节,以助社会探索并促成更合理有效的教学操作及加强教育体制与成效的可能。

我们藉此介入理解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为此,大家必须面对全球一片“希望萎缩”的主导气氛下本地教育界出现的混乱、绝望及犬儒^{〔2〕}的状况,并从因应各方在地处境的角度,把“希望”和“绝望”的文化政治思考问题化为教学法(pedagogy)和实用法(pragmatics)这两组互为表里的关键课题。我们的介入立足于我们自身的体制位置。

首先,我们将简单陈述香港整体的教育改革如何规范以至塑造了我们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种种教学及批判实践。接着,我们通过在香教育港的体制下,十年来共同“进行”具有教育实践效用的文化研究,反思有望把我们带到寻求“希望政治”的因素和途径。概括而言,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批判性的实用法(包括思维、以及实践)来辅助、来介入,让我们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让文化研究系的学生有能力于日后在五花八门的建制内外有效地应对,那么,在当今任何制度下,围绕“文化研究中心”(Grossberg 2005)所展开的文化批判及相关的知识生产,只会反过来令人失望,意志受挫,产生混乱、绝望及犬儒主义,并在学生、研究员、老师、NGO 工作者及社会运动者间蔓延。

要针对这样的落差、这样的虚妄的现实,以最终改善教育工作及社会效应的持续互动,我们或许得先问:为何文化研究要关心犬儒心态在建制及教学空间内蔓延?在虚妄的现实中,此番向内的省思和批判,对现时我们作为学者及教师身份所进行的

具体批判实践计划究竟有何影响?

批判而来的混乱效应:犬儒主义

2008年,我们的一位老师收到了一封来自岭南文化研究系毕业生的电邮,题目为:“好鬼愤怒”(广东话;意即“十分愤怒”)。他在一家面向中产读者的本地中文报馆工作。该报曾刊登了一篇有关香港特区政府调整公屋住房比例,实行大量房屋私有化的报道,他认为文章助纣为虐,而报馆编辑更粗暴、无耻地形容反私有化的行动者为“天真、自私、非理性”。这位刚从文化研究系本科毕业了两年的年轻人,显得愤怒不满,同时,也显得无助沮丧,在面对现实处境中、媒体机构内的粗暴语言及建制暴力,感到一筹莫展。

深感愤怒、沮丧、疲乏是文化研究系较为认真的毕业同学的普遍情绪,一旦在职场遇上被他们认为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境况,无力感即一拥而上。因为不论自己、身边的人都认定无法采取行动或介入“现存”的主导性建制环境,也不能带来实际的影响。于是,同学们容易堕入那个把士气拉得更低的恼人陷阱: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出路)。中肯地说,在保守的机构工作,不但批判的意见、进步的新意不受欢迎,就连认真地把指定的工作做好,有时都被认为是无甚需要、会受到很大压力的。^[3]在此环境下工作,具批判性的意见及对另类方法的想象很快就被满布多疑的目光认定为“超级挑剔”或“空谈理想,不切实际”,这甚至成为一种对文化研究同学特征的惯性描述。那些愈是认真思考要力求批判现状的青年学子,他们周围共事的人的态度愈是如此。于是,基于一种“反应姿态”(cf. Gibson-Graham 2006),种种深层的负面情绪,包括“斥骂、自保、指控及愤恨”很可能在理想幻灭、激进落空的年轻文化批判者身上根植。

讽刺的是,毕业生的此种情绪多少反映了文化研究教育的成功:同学有能力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霸权实践进行尖锐的批判。不过,他们的愤怒、沮丧及失望也可能同时指向了文化研究教育在寻找改造社会的有效方案上的局限。很明显,教学本身并没有帮助同学建立强健的自我,令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在进入“现实世界”的主流社会建制时,把另类的、可行的方案置放

[3] 例如,在一个官方举办的有关课程改革的咨询会上,我们当中一位向主席投诉,认为讨论一项还未把相关文件传到各人手中的项目,并不恰当,一位校长成员,态度轻佻地响应说:“这不更好,我们不用看文件?”

[4] 源自陈清侨 1997 年 7 月 5 日接受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记者 Wendy Kan 以《身份危机》为题的访问内容。

[5] Meaghan Morris, "Teaching versus Research?: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new class politics in knowledge".

和有效地介入到系统之中。

在社会的现实限制之下,年轻的毕业生要培育一份健康的自我感觉,就得从历史角度对香港的社会文化构成有充分的掌握。“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4] 鉴此脉络,文化研究的学生更需要透过一般被认为是美学主张、身份认同批判的文化论述模式,放入具体的、在地的批判性计划(project)里,不论它是在文学、电影、流行文化、政治或其他重要的再现模式和媒体中。

随着出版管道及社会文化经验的各种变动,香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过渡期以来,知识分子活动及学术性的文化研究愈益紧密,两者的接触为“文化评论”这项重要的社会实践,开创了独特的论述空间。各种论述变得愈形重要,甚至与当下社会运动的推动力扣连。这些在当代文化脉络下产生的学术计划,其批判性只能在特定的建制及社会文化生成条件下,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及认同。把批判工作看成社会实践,将为文化研究带来更多创新,并有助它发展为在地的实用计划。在经济资助愈形紧缩的情况下,学术界为求生存,也需要加大力度在这方面的投放(请参看墨美姬[Meaghan Morris]相关的文章)^[5]。文化研究系这个被学术建制化不久的年轻学科,即使当今仍未被文化研究学者们认受为一个真正的可能;但多年来,经过学术上、教学上的努力经营,已证明它在建制上可行,在方法论上可持续发展,与本地社会文化脉络中的相关环节互相扣连,同步衍生,取得了相当正面的成果。

从文化研究到教育改革

踏入 21 世纪,“别无出路”(TINA)这个故事再次发生在我们的毕业生身上,叫我们不得不检视自 1999 年开始在岭南大学教授的文化研究学士课程的教学效果。有关这个有十年历史的课程,其具体的内容设计可参阅网站:<http://jupiter.ln.edu.hk/cultural/programme/undergraduate-90.shtml>。在三年的课程里,我们除了为学生提供批判写作及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外,也希望能孕育学生对既存社会结构/关系和文化知识间的批判能力。当中,我们花上大量的时间,帮助学生摆脱他们取自中学教育的被动学习模式及既定习见。我们发现,经历过连续十三

年以考试为本的学校训练的同学,升上大学并修读强调“异议”及“批判”的文化研究,开始时确实没有能力去理解“现实世界”里各种文化及政治差异和角力的。他们对所有智性的研究计划所知甚少,也欠缺构思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能力,也不懂把课程中的多元面向整合一体。此外,岭南大学是全港最小型也是最弱势的学府,平均来说,学生的家庭背景、学习动力及自我评价都并不特别理想^[6]。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我们无论在校内或校外开展文化研究教育都有一定的困难。虽然 Giroux 所言说的都不离事实,教育永远不能被简化为连串的工具技能、考试及认证,但我们也同样应该强调,学生需要配备“知识型经济”所需的生存技巧。不少学生,毕业后均投身不同的文化领域,如当上教师、社团/NGO 工作者、艺术及媒体机构经理等等,工作上都需要他们独立规划、组织及评估各种任务,简言之,需要把相关的每一个专项做好,落实到位。如果香港的文化问题确实是一个有关文化多方发展的问题,我们会认为,今天文化研究的教育重点不单单在于文化评论本身,而在于教学应用及实用效果上。综观学生们过去在中小学的学习经验、薄弱的学术训练以及身处繁杂的社会背景,我们深感在三年的大学教学里,即使不是不可能,却实在很困难,一边提供基础的“生存技能”,一边有效地提升他们的批判意识。我们作为文化研究学者对此迷惑不解之余,深感迫切需要介入中学的课程改革,好进一步理解学生是如何受训去学习的。因此,我们研究并参与中学的综合人文学科及通识学科的课程改革,希望尽快地接合在中学阶段的文化研究的教学。简言之,我们非常渴望看到学生在接受我们“完整”的文化研究课程前,已尽早地解除了过往被主导的学习习性。

今天香港教育改革打开了文化研究介入教育领域的窗口(Hui and Chan 2006)。为了善用此机会,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检视本地中学的综合人文学科的教学成效。研究初步发现,以施行新学科的情况来看,各方教育改革的利益相关者(或称“持份者”),不论在使命、宗旨或实践上都有非常不同的理解,当中落差很大,整个改革过程显得复杂混乱、失诸方向。结果,相当有野心的一次教育改革,即使没有让不同的“持份者”产生利益冲突,却足以产生连锁的、不尽如人意的后果。

[6] 岭南大学的收生数目刚刚超过二千人,以“具香港特色的博雅大学”而独树一帜。其实,岭南大学历史悠久,可追溯至 1880 年广州岭南大学的源头。1968 年,即香港殖民时期被改为私立文学及商科专科学院。后逐渐发展,及 1999 年正式成为公立大学。因此,在本港特定的教育设定下,它作为推行通识教育的机构来说,年资显得较短。

从我们参与综合人文科教改的经验了解到,本地学校对政府提出的教育改革,被看成短期而表面的。负责的官员,同样地,以“交功课”的心态应付上司的要求,只要课程和教改方案基本上为各方“收货”,或反对的声音不致太大,负责的官员和课程发展主任便告“功德圆满”。老师及学生也策略地面对所谓的改革,也就是:不必太认真去看待。“求学不是求分数”是教育改革一句重要的口号,却顶多成为以公开考试成绩为本的主导教育机制下,一种口头的象征式改革用语。不过,不少老师仍然努力地设计新的教学方法,把日常教案排得密密麻麻,包括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辩论、戏剧教育、探访及“探究式”学习计划等等。学生大多乐意参与这些课堂活动,但下课前,总会查询老师工作纸的“标准答案”,以备考试。换句话说,教师、学生和课程发展主任都只想准时“交功课”,课程和教改安排是否真正符合教改的远景和目标,其实无关重要。结果是,教师无奈、学生沮丧,进一步强化反智、犬儒、命定的心态和行为,也同时令想真正落实理想的课程改革的教育者,举步难行。结果,从各方社会拉过来的资源,逐渐地被大量消磨,当中包括一些怀着热诚,想把创新及批判教学带入教育系统内的有心人。(请参看 Hui 2008)

作为“外来”的研究员,我们可以比较有距离地观察和反思中学教育出现的问题,当中包括课程设计、评核与预定的远景和目标之间的差距。到底,教育改革及相关实践出现一片“混乱”,是失败的征兆,还是可能性的标志?虽然中学教师大多认同前者,但我们宁愿选择后者,并对大量涌现的“可能性”征兆,进行批判的检视。

作为教育计划的文化研究?

对中学课程的研究让我们明白,在本地教育改革的脉络下,一味向中学生介绍批判意识,用上文化研究的教学方法,是不足以帮助学生进大学前就摆脱规训宰制式的学习模式的。事实上,我们需要提供及鼓励更实用、更有建设性的介入,令各方的社会能量,配合批判思维,与另类的可行实践方案在既定的建制框架内得到真正的联结。

我们曾在别处讨论过有关文化研究为今天教育带来的批判及实际应用,并强调,必须要充分理解教育作为一个文化过程当

中的复杂性(Hui and Chan 2006, Chan and Law 2008)。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致力介入中学的课程实践及课堂上的实际教学操作。过去几年,我们曾为学校教师提供“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以学校为本(school-based)及项目为本(programme-based)的训练课程,以此探讨在主导的“知识型”经济下教学的文化面向及教育政治。我们频繁地参与校内及课堂内的课程改革实践,为的是从过程中探索文化教育的局限及机会(Hui and Pang 2008)。此外,我们也希望在既定的教育框架下,以更实可行的方法去进行文化研究的实践。当我们一方面以研究员/合作者的身份参与中学的课程改革,一方面继续在岭南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时,我们开始认真反思,到底我们为文化研究系的学生提供了什么?透过参与本地中学课程改革,我们对中学学校教育的理解,会不会反过来启发我们改革、变更在大学里教授文化研究的方法?如果将中学课程改革的观察看成一面镜子,它将反照我们文化研究课程的效果及局限。若把检讨中学课程改革的标尺,照搬如仪地,放到我们的大学课程上,将看到什么?

也许,是时候反问自己:到底文化研究的教育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7]我们的教学到底处在怎样的脉络中?是否有效地规划及执行?如果我们坚守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教育计划,这些批判性的自省问题是不能不提出来的。按 Grossberg(1997)对文化研究主要工作的分析,以上问题归类为三个面向:教育计划(project)、脉络(context)、扣连(articulation)。为了具体分析文化研究本身作为教育计划的特质及操作,我们提出有关受众问题(如谁需要文化研究?我们代表谁发言?),也反思计划视野及目的(例如我们为何做这些?我们期望自己的教学及研究有些什么效果?)。也要问如“到底我们这个计划处身在怎样的建制及知识脉络里?”一类有关脉络的问题,才能进一步了解计划的局限及可能性。同时,为了更实质地评估我们的教学及研究成效(包括过程及结果),我们也着重有关扣连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带动及整合社会各方的动力,为重组、改革既存社会权力架构及关系而结盟呢?为达成目标,我们的规划及操作工作有没有做好?以及“所有规划、执行及评估工作是否跟计划的远景及目标一致”?

经过连串的自省式反问,最后我们都要回应这个问题:如何确认行动的成效?又如何评估这些成效是否符合预期的远景,

[7] 2008年初,文化研究学士课程需要接受校外评估,为了达到更官式的“质量确定”,在此初步的分析是亦谐亦庄的。

它们是不是我们想见到的成果？事实上，相近的问题，即使在不同的脉络下，比如，在我们进行中学课程改革研究时，以及跟其他地方的文化研究学者包括如上海的王晓明、澳洲的 Ien Ang 和 Jeannie Martin、印度的 Tejaswini Naranjana 等合作不同的学术计划时都有提及。连串的触发事件，迫使我们批判地审视自己作为文化研究教师及研究员，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

文化研究的实用转向：重拾希望

相信毋庸赘述，本地犬儒主义蔓延，在这个从全球一片“希望零落”的文化脉络下变奏出来的心态以外，去寻找希望是多么重要。不过，我们先要辨识“什么是可能的”及“什么是无可避免的”，才能从“反”扣连的困局走出来，重新跟我们致力展开的“希望计划”相关的各种论述及实践联结。此做法让我们认清当前教育面对的危机，重新评估文化研究本身跟社会脉络的相关性，以及作为批判的知识性计划的成效。我们一直从事具体的文化研究工作，无论是研究、教育或各种团体接触，都坚持将文化批判与脉络生产连接起来的策略(contextually-formed)，务求把重整文化研究，并将之组成为可持续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re-constitution)。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实用的策略，必须跟毕业生早晚要进入的职场，也就是既存的权力架构及主流建制挂钩才能成事。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想知道，文化研究作为推动变更及改革的教学计划，可以从本地中学教育改革里汲取什么经验？我们关心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是不是一项实用有效的介入课程(a programme of intervention)？文化研究学系在面对制度化的情况下，是需要生存及发展的，因此可以理解，我们重新把课程扣连到过去十年来我们一直从事的有关文化研究的各式设计及功能，并走向一项“希望计划”，是急切而重要的。

始于 1999 年的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士课程是华语世界首个同类的学士课程。文化研究系于 2000 年成立，教职队伍并不庞大，共 11 人，每年收生约 33 人。教师主要致力教授学士课程及从事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此外兼教院校内的通识课程，并把约 40% 至 45% 的教学资源放在通识中，可见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岭南的课程一直紧密跟社区、媒体及专业组织合作（例子可参看 Hui and Chan 2006），此外，开办数量不多的硕士研究课